

神学系列

⑤



# 中国教会史

Chinese Church History

# 中国学人培训材料

## 神学系列⑤

### 中国教会史

著者：元西门

## 前言

本册《中国教会史》是《中国学人培训材料》神学系列的第五册。作者元西门教授针对下列中国基督徒及慕道友常提的问题而编写：

- 基督教是何时进入中国的？
- 近代基督教来华，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何关系？
- 传教保护条款对宣教工作产生哪些不利及有利的影响？
- 基督教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吗？
- 民国建立以后至 1949 年的中国教会如何进展？
- 1949 年至今的中国大陆教会如何发展？现况如何？

作者以精简扼要、流畅平实的文笔，特别配合《中国学人培训材料》的格式来执笔；其内容对中国学人所受的教育背景极有针对性。限于篇幅，本册材料无法做详尽的研讨，对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教会历史，也未能兼顾；若学员读完这本入门书以后，有心对中国教会历史做更全面的了解，请参考本册所提供的〈进深书目〉。每课后面的〈作业〉，可用于自习，也可用于主日学课程中的讨论，请参考后面所提供的答案。

# 目 录

- 第一课 基督教早期入华史概述
- 第二课 新教来华
- 第三课 传教保护条款和民教冲突
- 第四课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 第五课 从五四运动到“非基”运动
- 第六课 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
- 第七课 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 第八课 当代中国教会

参考答案

## 第一课 基督教早期入华史概述

新约马太福音第廿八章第十九节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从此，一代接一代的基督徒，都遵奉耶稣的“大使命”吩咐，向全世界广传福音。

### 福音什么时候传来中国呢？

有人说，应从耶稣的门徒巴多罗买来中国算起。但这件事在历史文物和典籍中找不到印证，所以我们暂时只能把它当作一种传说。就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而言，关于基督教早期流传中国的历史，当以唐朝时的景教史实最为可靠。1625年，陕西省西安西郊出土了一块刻制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18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石碑，碑高四尺七寸半，宽三尺五寸，上端刻着十字架。据这块石碑碑文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士阿罗本来华，唐太宗特遣重臣房玄龄迎入长安，为他建教堂于义宁坊；高宗时代，朝廷在全国各地兴建景教教堂，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所谓景教，学者们根据上述碑文和1899年在中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景教文献进行研究，确知它就是基督教的涅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这个教派有句名言：“上帝并非两三个月大的婴儿。”反对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由于他们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所以在431年的以弗所第三次大公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此后，这一教派在波斯建立了基地，并派传教士来到中国。

845年，唐武宗主要因经济上的矛盾，下令消灭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等外来宗教也遭受池鱼之殃。这次消灭宗教的做法非常彻底，以至于佛教所有传统的大支派和景教等外来宗教都一蹶不振。唐朝以后，中原已不见景教的踪影，仅在中国北方的部分少数民族中有所流传。

元朝（1217-1368年）时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得以在中国复兴的景教，却有了“也里可温”教的新名。“也里可温”本是蒙古语，意思是“奉福音的人”。1300年，中国已有三万景教徒，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崇福司”的机构，对他们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这时，天主教也开始传到中国。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流派，元朝人也称他们为“也里可温”。当蒙古大军西进欧陆的时候，天主教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专使于1245年到达中国，朝见元定宗。元定宗信了天主教以后，法国国王派了三位修士到中国联络，可惜来到时元定宗已去世，只带回了皇后的回信。此后，元朝和罗马教廷常有使节往还。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托两位来华经商的意大利商人返国时去罗马请求教皇派科学家和宗教专家一百人来中国。教皇闻讯，派修道士和意大利商人同来中国覆命。他们不幸在途中遇到战争，修道士折回，只有意大利商人到了中国。其中一位商人的儿子名叫马可波罗，他根据途中见闻写了一本书，就是世界知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1294年，约翰·蒙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的差派，来中国大都（今北京）传教，受到元成宗的欢迎。他在大都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曾为六千人施洗。

元朝时“也里可温”教虽然兴旺一时，但只在蒙古人，西域人和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当中传播，所以一旦执掌政权的蒙古人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中原，“也里可温”也就随风而去。

明朝末期，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下了十年功夫学习中国语文，然后攻读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皆晓其义；又通过译书和示范，把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医药、机械，以及制作枪炮的技艺介绍给中国。他翻译的西方著作，都献给朝廷，所以很得神宗皇帝的器重。明末时，官僚和士大夫信教的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宰相的徐光启以及李之藻、瞿式耜等人。

利玛窦在中国立定脚跟的原因，首先是他按照使徒保罗所讲“在什么样的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国化；第二，是他深知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努力争取其同情和支持；第三，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身份结交中国官僚、士大夫，取得成功。

1644—1662年，是明清两朝交替期。耶稣会士平安地渡过了这一动乱时代，并得到新朝代统治者的重用。年轻的清顺治皇帝，对负责整顿历法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特别敬重，称呼他为“玛法”（满洲话：父亲）。

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政权掌握在鳌拜等保守大臣手中。他们制造了一桩称为“历狱”的冤案，事先已拟定要把汤若望处以“肢解”的酷刑。不料，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在朝廷上正式定案宣判之时，忽然发生强烈地震，保守大臣大惊，改判汤若望“监候斩”（死缓）。此后三天，北京地震不断，人们不敢进屋做事睡觉，人心惶恐不安。太皇太后出面，令立即释放汤若望；但同案受牵连的李祖白等五人都被冤杀，“历狱”也未平反。次年，汤若望去世。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事务，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皇帝对西学有强烈的爱好，每天都要与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传教士一起讲习，同时对基督教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1700年，中国教会兴旺发达，信徒已达三十万人。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礼仪之争”：耶稣会士学习中国古典，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国的上帝，孔庙是学者聚会的地方；认为烧香、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先人的尊崇和纪念。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礼仪采取包容态度，在基督教的仪文中，则允许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变通。多明尼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对耶稣会士的这些做法大为不然，于是将此事上报教皇，引起一场长达七十多年的“礼仪之争”。争论初期的几位教皇基本上同意耶稣会士的做法，但反对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也就逐渐使后来的教皇改变了立场。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批准公布掌管教义审理的“圣职部”制作的一个文件，禁止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中的变通办法，同时派多罗主教来中国，希望中国方面对这个文件有所谅解。1705年4月，多罗到达北京，康熙皇帝先是以礼相待，后来见他对自己的意见不肯稍有迁就，就下了逐客令。1706年，康熙皇帝下达一道圣旨，宣布凡传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许传教的印票，并同意使用中国礼仪，才准传教。耶稣会士将这道圣旨转呈教皇，希望对1704年的文件有所变通，然而教皇格来孟十一世关上了与中国皇帝和解的大门；不仅重申1704年的文件有效，而且发布新的指示，强调说凡是不绝对遵守1704年文件规定的人，将被开除教籍。

康熙皇帝没有得到教皇让步的任何表示，就于1722年去世。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本来就不赞成基督教，后来因其政敌有基督教的背景，对基督教就更加痛恨，于是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以至于日后新教（编注）传教士来华传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

编注：作者于本书中所用的“新教”一词，指十六世纪改教运动后的更正教（Protestants），即今日通称的基督教，有别于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基督教是鸦片战争后随帝国主义来中国的，是吗？
- 二. 因基督教从海洋上来到中国所以叫“洋教”，对吗？
- 三. 什么是“礼仪之争”？你对争论双方有何看法？

## 第二课 新教来华

十九世纪是全世界教会普遍觉醒时期，新教徒为遵奉耶稣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视海外布道工作，并不遗余力地加紧推行，涌现了一大批舍身奉献、广传福音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1807年9月7日，英国差会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抵达澳门。当时的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完全是一片陌生、神秘而诡异的土地。马礼逊来华之前，有人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改变中华帝国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说：“不，我不能；但我期望上帝能做到这点。”

满怀热情的马礼逊到澳门后，才发现在偌大一个中国面前，自己却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清朝政府厉行海禁，海路通商，只限广州一口，而且贸易双方只限固定的专门机构：中方是广州“十三行”，英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就是说，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外国人根本不能合法地进入广州；即使进了广州，活动范围也限制在“十三行”地区，根本接触不到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他还发现，自己在这里是一个谁也不欢迎的人：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欢迎传教士，是恐怕传教活动会招惹上麻烦，可能给公司的生意造成不利的影响；澳门不欢迎他，因为澳门属葡萄牙所管，而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当然不喜欢新教的传教士在这里招摇。他还发现，传教需要语言沟通，而学习中文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清朝政府严禁向洋人传授中文，有胆敢教授洋人学习中文者，一经发现，往往要被当作汉奸处以死刑。

为了能以合法的身份在澳门住下来，马礼逊不得不加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学习中文，他付极高的薪酬聘请了中文老师。那位老师身上经常揣着毒药，准备万一被官府发现，就立即仰药自杀，免得受酷刑摧残，更免得牵连家属。

马礼逊独自一人在澳门工作了七年。到了1814年，伦敦会才派了米怜（William Milne）来协助他。但米怜没有合法的身份，澳门当局只允许他短暂停留。米怜和马礼逊商议：在广州根本不可能传教，在澳门开展工作也有诸多不便，不如把传教基地建在南洋英国或荷兰的殖民地区，那里新教势力较大，便于开展工作；而且那里有许多华侨，可作为传教对象。后来选定的南洋基地是英属马六甲，那里的工作由米怜主持。

马礼逊在澳门、广州等地工作了二十七年，若说直接传教，他的功效不高，一共只发展了十名信徒，不过其中有两位留名青史：一位名蔡高，是中国第一位受洗的新教信徒；另一位名梁发，是中国第一位新教牧师，近代中国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因洪秀全读了他撰写散发的福音小册子《劝世良言》而起。

马礼逊一生中最大的成绩在文字工作方面。首先，是他以个人之力翻译了圣经。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当时许多权威人士和机构对这件事都望而却步：英国德亨的主教认为进行此事所需经费浩大，无法供应；经坎特伯里大主教提议，基督教学术推进会经过四年时间的考虑，终于断定在当时翻译中文圣经没有可能；而1804年新成立的圣经公会也自认对此事无能为力。然而就在这时，年仅二十多岁的马礼逊默默地开始了这一伟大的工作。他以天主教巴设的《新约译稿抄本》为基础，经过长达六年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译成新约，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接着，又与米怜合译旧约，1819年译成后于马六甲出版；1823-1824年间，又将新、旧约合为一本出版，名为《神天圣书》。此书开圣经中译本的先河，其出现是中国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次，是他参考

数千种中文典籍编写了一本华英字典，名为《五车韵府》，于 1823 年在澳门出版。此书不但为日后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文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始兴办教育。1815 年，米怜在梁发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开办了一个启蒙学堂，招生五名。1818 年，在这个学堂的基础上，办起了“英华书院”，课程除中文科目外，大都搬用英国现行的中学课程。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

马礼逊又最早在中国开办基督教医疗服务。1820 年，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式医馆，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传教的媒介；1827 年，又增设一家眼科医院；六年以后，又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眼科医生聘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担当。

1815 年 8 月 5 日，马礼逊、米怜、梁发等人又在马六甲策划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既宣扬基督教教义，也反映社会现实状况，影响至为深远，被称为中国报业史的“先锋”。

马礼逊于 1834 年 8 月 1 日病逝于广州。在华传教士和洋商为了纪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1839 年，该会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学校，聘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勃朗（S. R. Brown）为教师。这所学校首批六名学生中，有三位后来赴美国升学。其中的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学成归国，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带领包括詹天佑（后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铁路工程师）、唐绍仪（后为国务总理）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国少年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在中国留学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篇章。

马礼逊是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他除了直接传教外，还进行写作、兴办教育、印行报纸、开展医疗，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彻底奉献精神将永存在世世代代的中国基督徒和所有中国人的心中。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马礼逊来华传教之初，面临哪些困难？
- 二. 马礼逊在中国有哪些“第一”？
- 三.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有何关系？

### 第三课 传教保护条款和民教冲突

1840-1842年，中英两国为了鸦片贸易的问题兵戎相见，英国人靠坚船利炮打败了古老而落后的中国。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五个通商口岸（简称“五口”）供洋商来华贸易；此外，洋人还取得了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领事裁判权”）。传教士是洋人，也自然享有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利权，但《南京条约》及其后续签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都没有关于传教的内容。

1844年6月16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广州望厦村会晤，谈判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担任美国公使顾盛的翻译，而中方首席代表耆英及其副手之一的潘仕成都是柏驾医生诊治过的病人。该条约第十七款，准许洋人在五口议定的界址内租赁民房或土地建立医馆、礼拜堂或坟墓。这一条款是潘仕成为了报答柏驾医生给他本人和父母的医疗服务所加。耆英对这一条款未加反对，则是碍于情面。于是，传教士第一次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传教利权。

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美、俄外交、军事人员以“中立”身份随行。美国外交人员中，有两位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丁韪良（W. A. P. Martin）。6月中旬，中美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美方拟定的第二十九款，是“宗教容忍条款”。中方代表担心洋人假借传教名义进入中国内地，暗行其政治、军事干涉阴谋，所以坚持不允。美使列威廉不愿因小失大，打算放弃这一条款，立即与中方签约。卫三畏为此事担心，彻夜不眠，终于想出一条可能被中方接受的条文措辞，立即与丁韪良商议改定，其文如下：

“耶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这一条文为中国代表接受，于是传教保护条款得以成立。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也有类似条款（第八款），而次日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中第九款进一步写道：“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凭着传教保护条款，传教士就可以深入中国内地传教。1860年，法国又强迫中国签订《中法续约》（《中法北京条约》），其中文本第六款写道：“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以后各国传教士皆依“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取得这种利权。然而，在该条约的法文本中却没有这样的话，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狄拉玛塞进的私货。可悲的是清朝的外交官不懂法文，将这一私货全部收下。几十年后，狄拉玛的奸计才被懂法文的人揭穿，可是这一私货条文已在中国各省生效多年了。

西方传教士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保护条款，打开了在全中国自由传教之门。1858年，在华西方传教士仅八十名，活动范围限于“五口”和香港。1900年，西方各国入华传教的差会已有一百三十多个，传教士达二千人（不包括中国籍传教士一千六百人），四十年间传教士人数增长了二十五倍之多，而且传教范围遍及全中国。但是，这些西方差会所建立的教会，西方色彩很浓，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排拒它，就是对它不屑一顾，因此信徒人数的增长不快。虽然当时信徒已有十一万二千八百零八人，但在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只占大约万分之二点五。

鸦片战争以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满腔热情地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可是中国的大门一直紧闭，使他们广传福音的壮志难伸。正在此时，来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经济利益，他们用大炮狂轰中国的大门。一些传教士见有机可乘，就因时利势地积极谋求自由传教的利权；他们当中有人宣称：中国是异教国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是上帝借以向中国广传福音的工具。另一些传教士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认为，到中国传福音必须进入中国，为了进入中国，利用一下列强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也并非不可。

然而从圣经的立场看，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门长期紧闭，无法进入中国传福音的情况下，对上帝旨意信心不足，竟然利用人为的方法来达到进入中国的目的，实为绝对的错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不提倡用暴力达到任何目的，福音的传播根本不需要任何武装力量开辟道路。

平心而论，西方列强和传教士并非一丘之貉。列强武力侵华，主要是为了贸易利益；传教士和平进入中国，主要是要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但他们之间又有两点巧合：一是来华时间前后相差无几；二是要进入中国的目标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可说是一种相互利用：一些传教士要借用列强的势力进入中国；而列强也正好利用传教士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要知道，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往往难以公诸于世（比如，鸦片战争是由于英国罪恶的鸦片贸易受阻而起，但英国人总是回避这点），而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以传教受阻或传教士被杀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无疑要冠冕堂皇一些。

把所有的西方传教士说成“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对绝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来说实在冤枉。然而，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保护条款把基督教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活动联系起来也是历史的事实。这为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招来无穷的误解、敌意、仇恨和冲突，给福音在中国的传播造成极大的阻拦和障碍。

凭借传教保护条款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慢慢发现，这些条款并未给他们带来充分的安全保证。这些带着特权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被中国人视为传统秩序和传统文化的破坏者、毁灭者，因而招致广大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抗拒。民间反基督教的浪潮汹涌澎湃，迄 1900 年为止，全中国范围内爆发的严重民教冲突（中国人民与基督教的冲突，又称“教案”），有四百多起。最大的民教冲突，当数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传教士死亡二百四十一人，中国教徒死亡达二万三千多人，教会财产损失无计其数。八国联军趁机攻进北京，强迫中国接受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使中国遭受巨大的物质财富损失，并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许多人凭着信心，在耶稣“大使命”的导引下进行传教工作，并不藉重传教保护条款。著名西方差会中国内地会领袖戴德生（Hudson Taylor）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1868 年，刚到扬州传教才两个多月的戴德生等人就在当地人强加的“拐卖儿童”的莫须有罪名下遭到攻击，戴德生的寓所被民众打砸抢烧，身怀六甲的戴夫人和秘书白小姐跳楼逃命时身负重伤。戴德生一向反对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向本国政府上诉，认为这种做法既违背圣经的教训，又不合情理，而且容易引起误会；他主张，传教士如遇威胁，应向当地政府报告，倘无效果，则应专倚靠神。因此他没有寻求英国炮舰的干涉，事后也没有要求赔偿和进行报复。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中，戴德生领导的中国内地会有五十八位传教士被杀，事件平息后，中国内地会却拒绝了清朝政府对这些殉道者所作的物质赔偿。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什么是传教保护条款？它对传教事业有何作用？
- 二. 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侵华有何关系？
- 三. 戴德生怎样面对民教冲突？你对此有何评价？

## 第四课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基督教来华初期，传教效果不大的原因，除国人的大力排拒外，还有传教士的传教方法不为国人所喜。

当时，传教士直接布道的主要形式是街头宣讲、巡回布道和散发传单。街头宣讲和巡回布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传教士所讲的福音很难打动人心；人们往往抱着看稀奇事物的心态来观赏洋人出洋相，某些人有时还会对传教士嬉笑怒骂，甚至抛石驱赶。散发传单的效果也差，因为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差，雇来帮助编写传单的人也大多数不具备足够的学养，传单文字常常词不达意，有时甚至不知所云，以至于阅读者兴趣缺缺。梁发说，据他所知，只有一个人的信主经历似乎与阅读传单有关。

一些传教士慢慢发现，办教育是一个有效的传教途径。最初传教士办教育，一是为了让人识字才好读圣经，二是想主动担负起教育中国人的责任。在办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明白，这才是在中国传教的一条绝佳途径：学校开学，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忠实听众，任你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大讲其基督信仰，学生们总是那么认真而虔诚地洗耳恭听。除了学校的课堂，在当时的中国，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布道场所，又上哪里去找得到这么听说听教的好听众！

传教士最早开办学校，要从 1818 年马礼逊等人办英华书院算起，但 1818-1875 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1875 年的中国，共有教会学校八百所，主要是小学，学生有三万人。1875 年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教会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所以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迄 1899 年为止，教会学校已发展到一千七百六十六所，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

1905 年，中国废除科举考试，各省纷纷建立新式学校，但其教学水平根本不能与已有近百年办学实践的教会学校相提并论；实际上，当时各级新式学校的教师，绝大部份来自教会学校。当时的教会学校，可说是日正中天，几乎每一间教堂的附近，就必然有一所新式学校。此外，女子上学，也是教会学校开风气之先；为了方便女子上学，教会还办了一些专门的女子学校。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在少数民族当中兴学。英国传教士格柏里在人迹罕至的苗乡贵州省石门坎办学，使几千年来只有极个别识字苗民不仅有了小学生、中学生，而且有了大学生，使石门坎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通公路的闭塞地区被当时人称为“中国西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918 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

办医疗是传教士的又一传教途径。传教士早期开办的医疗机构，可以追溯到 1820 年马礼逊在澳门设立的中式医馆。1834 年，伯驾在广州行医，可作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的正式开始；他在次年办起的“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发展到 1914 年，在中国的教会医院里，有外籍男医生三百人，外籍女医生一百三十五人，外籍护士一百一十二人，华籍医生九十四人，门诊治疗达二百一十三万人，接受住院治疗为十二万七千人。教会医院对贫苦的病人赠医施药，既解除病人的肉体痛苦，又尽量找机会拯救他们的灵魂，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都深为感动，不少人因此而信仰耶稣。

教会兴办的学校和医院都有社会福利性质。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社会福利事业都是教会率先兴办起来的。其中，1840 年德国差会巴陵会在香港开始的孤儿院，1874 年北京穆雷希尔盲人院的建成，1887 年登州出现的聋哑学校，1891 年圣公会傅特医生在广东北海伦敦会普仁医院中附设麻疯

病院，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芳村建立疯癫病院，都可以冠以“中国第一家”的徽号。此外，中国是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救灾在中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工作，一有灾荒，国家和社会都要大力赈济。1876-1879年，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死亡人数高达二千万之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通过努力，在海内外征集到大批救灾物资，又及时送到灾区分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朝野上下的盛赞。

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立国的基础之一，医疗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教育已经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现代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则从无到有，并有长足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热衷于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引进中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认为：传教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板结”，基督教既难于在这种土壤生根，更难以开花结果。要中国人顺利地接受基督教，就应该让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这是为福音广传必须进行的预备工作。他们进行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进入中国政府的洋务机构，担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工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62年进入清朝训练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担任总教习，主持馆务三十多年，把同文馆办成了一个全面讲授西方文化科技知识的学府。1898年，丁韪良又受聘就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为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

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在基督教报刊当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成为当时关心国是、忧心大局的各界人士争相阅读的报纸。清政府内主张搞现代化的洋务派高官张之洞、曾纪泽等经常阅读该报；力主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非常重视该报，曾下令按期呈览；搞戊戌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成长，也是源于这张报纸；革命党人有许多也是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万言书》就首次发表在这张报纸上。

基督教的出版机构，主要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广学会。广学会通过编译西书，介绍西学、鼓吹新政，启迪民智、匡时拯俗，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民国建立三个历史阶段中都起到了领导思想新潮流的作用。迄1907年为止，广学会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籍，累计印数近百万册。当时阅读广学会书籍蔚然成风，朝廷命官、士大夫和社会贤达，几乎是人手一册，影响至为深远。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在中国兴办了许多现代教育、医疗、福利事业，出版了许多书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科技知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业迹斑斑，有目共睹。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笑纳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化厚礼，却拒绝了他们传播的福音。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关系如何？
- 二.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关系如何？
- 三.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如何？

## 第五课 从五四运动到“非基”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皇帝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不彻底，政权很快落入军阀之手。革命党在南方树旗抗争，地方军阀趁乱割据，国内战事频繁，时局动荡不安。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侵华，甚至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大敌。中国人民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军事侵略活动，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罪恶行径痛恨至极，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

1919年，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事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本可凭战胜国之一的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掠夺的利权，可是由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然把这些利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全国大哗。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发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怒吼，掀起了民族救亡的高潮，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是留学西方或日本的知识份子，深受当时西方科学实证、唯物无神等反传统反基督教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五四”运动民族救亡、反帝爱国的主旋律中，也跳跃着反传统、反权威、唯科学、主实证、重物质、轻精神以及反基督教的音符。

在“五四”运动时间，西方基督教差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大都不合时宜地以“政教分离”作为理由，不让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这一作法实足以“坐实”民间早已有之的“信了洋教不爱国”、“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流言，引起多数民众对基督教的反感。这种反感。受到某种刺激，就会化为愤怒，形成攻击力量。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将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这次大会所作的筹备工作很有吸引力，招致激进的反基督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上海的一群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于3月9日发表宣言，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开会，并攻击基督教，又通电各大城市，呼吁广大学生行动起来，联手遏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十天也发表宣言，责骂基督教。4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那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三千人大会，反基督教情绪十分高涨，成为非基运动的一个高潮，鼓舞了京津地区非基运动的开展，会后有许多大专院校都发表了非基督教声明。当年暑假开始以后，学生分散，运动才停顿下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大革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普遍高涨。4月间，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遭英国校长否决。学生与校方对抗，并发表宣言，争取校内集会结社自由，而且提出“争回教育权”的主张。在他们的带动下，徐州、南京、福州等地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学潮。

教会学校的学潮的高涨，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再起。当年夏天，几个被上海基督教浸会书院勒令退学的学生发起非基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8月间，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执行委员（主席）由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而同盟的规章制度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草拟。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对基督教发动全面猛攻。同年12月，非基督教同盟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12月22日，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非基督教周”行动开始，反教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

分队讲演；一部分人涌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围攻教士，甚至以飞石掷击教堂，行动非常激烈，掀起了非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老板杀害中国工人。同月30日，上海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工人，遭英警开枪狙击，造成大量伤亡，史称“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反应强烈，掀起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在这场反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中，一向被大多数国人视为“帝国主义先锋”的基督教遭到巨大的冲击，教会学校中的学潮波涛汹涌。从“五卅”到年底的七个月时间内，各省出现的教会学校学潮多达四十三起。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发生，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军队或党部占用，教产被随意使用或破坏，教会的损失极为严重。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一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关门大吉，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内战大兴，非基运动逐渐远离国人瞩目的焦点。同年12月1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有浓厚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女士结婚，虽然他当时还未成为信徒，但这一婚姻的缔结不能不影响到整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度。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潮受到限制，与学生运动不可分割的非基运动也就沉寂下来。

非基运动从单一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有政党组织的运动，以后汇入反帝国主义的急流，又进一步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对中国教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压力。面对非基运动的疾风暴雨，教会中人的态度颇不一致：一些人认为，阳光下无新事，非教反教之事，历来多有，却无碍于基督教成长壮大，对于非基运动，最好是漠然视之，所以主张保持沉默；也有人从护教的目的出发，对非基运动的攻击言论反唇相讥，奋力抗争；还有人从非基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对教会自身的缺失深自省察，并主张改革教会，以应付新的社会环境，面对新的社会潮流。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为什么非基运动对中国教会有越来越大的冲击力？
- 二. 教会中人对非基运动的反应如何？

## 第六课 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

西方基督教差会凭借传教保护条款在华传教的做法，招致中国民族主义的排拒，给中国教会带来无穷祸患。一些眼光比较远大的西方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已指出：中国教会，必须是有完全自主权力，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并成长壮大的最大保证。

二十世纪初，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的中国教会逐渐出现。1902年，谢洪赉、宋耀如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平信徒领袖在上海慕尔堂发起中华基督徒会，其宗旨是向世人表明，对中国基督徒来说，爱国和爱教并不矛盾，同时也想自传福音到西方传教士足迹未至的广大国土。但那一时期，独立教会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反教人士猛烈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才醒悟到应该把教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信徒。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也意识到，为了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化的教会，于是针对原来大部分教会对“外人、外资、外治”的依赖，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

二十年代，出现了由各地“三自”教会组成的“中国自立教会总会”。西方差会在不同宗派的教会，也联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虽然这些教会还不能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存在，但在领袖人选和管理方面，中国信徒的比重逐渐增加。

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由华人领袖建立的完全脱离西方教会传统的自立教会，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灵生、魏保罗等人建立的真耶稣会，敬奠瀛建立的耶稣家庭，倪柝声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和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它们都是“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没有任何组织上、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1949年前后，真耶稣会在全国有一千所，信徒约八万人，基督徒聚会处有一百间教会，信徒超过七万人。这两个自立教会，再加上耶稣家庭，共有信徒二十五万人，超过全国基督徒人数的四分之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多变，战火纷飞，灾难频仍，物资匮乏，人心空虚，中国基督教布道家应时而起，在属灵的工作上，取代原来西方传教士的地位，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有王明道、陈崇桂、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王载、贾玉铭、赵世光等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奋兴运动。

布道家足迹所到之处，中国教会都掀起了奋兴的热潮。布道家通过个人见证、户外聚会、福音大会、奋兴培灵等活动，同信徒一起认罪、悔改、奉献，使原来死水一潭的一些教会变得生机勃勃，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一些听过他们布道的信徒，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这批布道家大多没有差会作后盾，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不为生活而担忧，只管凭着信心，放胆大讲真道。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神学的训练，除宋尚节曾获美国化学博士头衔外，其他的人大概都只有高中学历。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凭着十足的信心，以满腔的热诚和彻底奉献的精神传扬真道，所以灵性的活水能从他们的口中如滔滔河水一般汹涌而出。虽然他们讲述的内容比较简单，在某些神学家看来，甚至可以说肤浅，但他们有圣灵灌注的布道的确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教会，同时震撼了成千上万中国基督徒的心灵。他们在中国教会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来华的所有传教士，尽管后者当中的不少人神学训练有素，哲学思想高深。

这批布道家的共同特点是充满灵力，但由于各人的恩赐不同，布道的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宋尚节和计志文主要在教会里鼓动复兴；王载和赵世光注重向非基督徒布道；王明道强调信徒的圣洁生活；贾玉铭注重灵修；而倪柝声则特别强调灵命。他们都是成材的大器，是圣灵兴起的中国教会的新一代领袖。

布道会燃烧起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布道家的举止、作风也一时成为人们模仿的榜样。虽然模仿者大都难免东施效颦之讥，但布道家在当时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在这批布道家当中，以伯特利布道团的宋尚节、计志文影响最大。他们的布道团花了四年时间，巡行布道五万里，足迹印遍全中国，因参加他们布道会而坚定信心和受洗归主的人数超过五万人。

复兴运动布道家的布道十足地中国化，信息内容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听他们的布道，不会使人觉得基督教是外来的“洋教”，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在复兴运动中，西方差会带到中国来的好些传统仪礼、形式习惯、行政作风和教条主义都被中国布道家抛到了一边，所以他们多有排斥西方教会传统的倾向。

复兴运动的布道家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批评之一，是他们的神学训练不足，理论基础薄弱；他们高举圣经，遵奉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却不在乎他们所持的中文译本圣经的译文存在不少可议之处。批评之二，是有的布道家布道过于情绪化。比如，宋尚节布道时，常手执一具小小的棺材模型大声疾呼：“发财！发财！发棺材！”一些对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甚至可能怀疑某一布道家是否有些歇斯底里。批评之三，是他们的思想保守，只顾及个人得救和末世的幸福，而把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略去不论。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为什么会出现自立教会？
- 二. 中国奋兴布道家有何特点？

## 第七课 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积极投身抗战。基督教爱国不落人后，也紧急行动起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各教会组成“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救死扶伤，安置难民，分发医药和食品；又成立“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广泛开展慰问将士，征集、输送物资等战区服务工作。

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大力支持中国教会进行战时服务、救济等工作的同时，又积极设法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金陵大学教授毕范宇等美国传教士组织“中国通讯服务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发布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息，并集中报导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受难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况，呼吁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战争物资，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陷，入城的日军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被淹没在滔滔血海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义无反顾地坚持留在南京城里，竭力保护遭难的中国民众，并冒着生命危险用实录、摄影等方法记录下日军屠城的铁证。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在校园中收容了数千名中国妇女，使她们免遭日军的强暴；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威尔逊，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医生，他日日夜夜在手术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国难民。

抗战初期，华东、华北、华南各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纷纷落入敌手。在沦陷区，教会产业多被日军侵占，广大教牧人员和教友动辄得咎，出现无数悲剧。一些基督教知名人士被日本人和汉奸杀害。教会领袖、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曾任上海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抗日爱国立场坚定鲜明，1938年4月7日，被日本特务操纵的汉奸恐怖团体刺杀于上海静安寺路街头。对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日本人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还不敢大胆迫害，但是不许他们去农村布道，只准在城市里活动。当时，城市里还有少许教堂在开放活动，乡村里的教会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下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会所属教会都被查封。所剩无几的几间教堂都由日本军方派日本牧师前去领导。日本军方为了便于控制，又强迫不同宗派的教会进行合并，结果使教会的数目几近于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顺德三处教会。沦陷区所有的英美传教士约一千二百人，几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 L. Stuart）。英美传教士在集中营里饱受煎熬，不少人因条件恶劣、营养缺乏致病，也有人因身体衰竭而失去生命。伦敦会传教士、曾获1924年巴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四百米赛跑冠军的吕道牧师（Eric Liddell），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中受迫害后因脑瘤致死。

抗战中期，日军想在短期内击溃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美梦已经破碎，正面战线基本稳定下来，在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各省，教会活动有了一定的开展。

撤退到大后方的基督教会，除了支持抗战，从事救死扶伤和救济难民工作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教会自身。虽然烽火不断，狼烟冲天，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新增加的信徒人数有十五万之多；一些教会还开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中传教，拓展了传播福音的新领域。与此同时，教会还积极进行内迁学生的救济工作，并向他们传播福音；为了帮助这批中国未来的人才，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和世界学生联盟携手合作，在英、美等国筹集到大批款项，并通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送到他们手中。

抗战期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大专院校都迁到了大后方。教会所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齐聚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华西坝，使成都成为大后方实力最为雄厚的高等教育中心。这五所教会大学不仅开设了丰富的高水平课程，还运用其强有力的科研力量帮助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教会生活开始全面复苏。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返回原来的工作场所。中国教会配合抗战胜利的形势，加强了传播福音的力度：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重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起了“三年奋进运动”；同时，向遥远之地、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许多基督教青年加入边疆布道的行列。据统计，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达九十三万六千零七十七人，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教会达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二间（此外，还有其他崇拜点七千四百二十六处），比抗战前增长约一倍。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版圣经，仅1946年一年间就分送三百万册。金陵神学院章文新博士主持编译的《基督教历代名著》五十三卷宣告完成。教会学校全面复课，仅1947年一个学年，申请上教会大学的青年人就有十一万之多。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国教会正在发展的道路上奔跑。

可是，中国教会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被国内政局的剧变扼阻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两党内战重开。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的国民党，打不过在抗战中迅猛壮大的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被赶出中国大陆。从此，中国教会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中国教会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抗战有何贡献？
- 二. 此一时期大后方的教会工作有何新发展？

## 第八课 当代中国教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前的9月，吴耀宗等五位基督教人士应邀出席了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次年5月，政务院（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等人，启发他们认识到：中国基督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为人民接受，中国教会必须革新。吴耀宗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撰写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呼吁中国教会拥护共同纲领（代宪法），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并要求西方传教士在短期内离开中国。此文于1950年9月发表，并先后征集到四十万名基督徒（约占全国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的支持签名。当年秋天，全部约六千名西方传教士开始撤离中国。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美国政府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地没收美国在中国的财产，但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大部份属教会所有，因此教会的损失非常巨大。

1951年4月，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各地教会都派代表参加。会后成立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吴耀宗以该会主席的身分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

从这次会议开始，教会中普遍开展了控诉运动和政治学习。控诉运动的对象是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中的亲美份子。政治学习主要是举办三自革新学习班，在学习班中，教牧人员不仅要学习时事政治，还要提高思想觉悟，进行自我批评。

1954年7月28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作为中国基督教“全国领导机构”。

三自会正式成立以后，在加强反帝爱国、革新改组教会、改造教牧人员思想的同时，又指控一些教牧人员和信徒为反革命份子。1955年，北京的王明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广州的自由传道人林献羔与同工及部份信徒被打成“大马站反革命集团”而被捕。1956年，遍及全国的基督徒聚会处的许多成员被当作“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要份子被捕（倪柝声本人于1952年4月已被捕）。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三自会副主席陈崇桂等一大批基督徒因批评政府或干部而成为右派份子，遭到批判、斗争，其中一部份人被押送劳改。

1958年，“大跃进”运动风靡全中国，教牧人员都被送进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几乎所有教牧人员都批判自我，表示愿意接受政府改造，于是政府就安排他们去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工作。这样一来，许多教会无人牧养，三自会于是在“教会合一”的旗号下安排“联合崇拜”，结果使教会数量大减。上海的二百间教会减少了九成，只剩下二十间；北京原有教会六十五间，减少百分之九十四，只剩下四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猛袭神州大地，全国城乡所剩无几的三自教会全部被“红卫兵”冲击摧毁或勒令关闭。在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和机构都被打翻在地：教堂被查封，教产被掠夺，圣经和属灵书刊被当作“四旧”（指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之物而投于烈火；许多教牧人员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关进监牢或押送劳改、流放。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逼迫是教会历史上空前苦难的一章。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成为阶下之囚。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现代化”，政府对宗教比较宽容。

中国教会不失时机地恢复活动。1979年4月8日，宁波百年堂恢复礼拜，上海、广州、厦门、蚌埠、福州、绵阳、天津、漳州等地教会相继跟进；到第二年，全国各省、市的礼拜堂基本上都恢复了聚会。1991年，全国已有七千多所教堂开放，聚会点则有三万多个。许多教会里也有很好的讲道、查经和祷告的聚会。

三自会的基本使命是保证信徒爱国，为了推动教会本身的教务工作，1980年10月，在南京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基协”）。基协的工作范围是：搞好教牧工作，开设神学院，举办义工培训班，印制圣经、赞美诗和属灵书刊，与国内外教会联络、沟通。

1981年7月，金陵协和神学院开学，接着各省、市的神学院也纷纷恢复上课。1991年，全国已有十三所神学院，在校神学生约七百人。

圣经的出版工作也得以恢复，新印刷的圣经超过六百五十万册，其中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比如1984年云南省出版了苗文《新约全书》一万册和傣傣文圣经一万五千册），此外还出版了赞美诗三百多万册和为数不多的几种教义小册子。

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长。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不超过一百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看不到基督教徒的活动，以为基督教已经真的“永世不得翻身”。谁曾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狂飙过后，教会重开之日，兴奋的人群像潮水一般地涌向教堂。要问今日之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可能谁也说它不清。仅官方的说法，就有一千三百三十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万和一至二千万等不同的“版本”，而且这仅仅是参加三自会和已向政府登记的教会信徒人数（详见本课第一题作业的答案），那些未参加三自会又未向政府登记的家庭教会信徒人数，要比官方掌握的统计数字大得多。有人估计，目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实际上极有可能已超过五千万。

今天的中国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就基督徒的人数而言，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有那么五、七千万的信徒并不能说多。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国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同胞从未听闻过福音。因此，在遵行耶稣“大使命”的道路上，中国教会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编注：有关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发展，本册材料限于篇幅，未能详述，请学员务必阅读本册进深书目中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和艾得理着《中国教会长征录》两书。

#### ■ 作业（讨论题目）：

- 一. 当代中国基督徒增长的情况如何？人数有多少？
- 二. 为什么出现家庭教会？其现状如何？

## 答 案

### 第一课 基督教早期入华史概述

根据本课内容，一、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已经三次入华，这三次入华都是从陆路来而不是从海洋上来。

三. 礼仪之争的内容已见于本课。笔者个人认为，耶稣会士较重视“本土化”，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尊重中国祭祖、祀天、尊孔等传统习惯，主张在基督教的礼仪方面有所变通，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派坚持西方教会传统，从保守的立场看也许不错，但不考虑“本土化”的问题是其缺失，以至于毁掉了清初传教的大好形势。

编注：有关祭祖问题，历年来中国教会已有不少讨论，其中有四本书值得参考：

- (1) ?徐松石着，《圣经与中国孝道的发扬》，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65年。
- (2) ?《基督徒与敬祖》，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这是1983年12月亚洲九个国家九十八位牧师召开「敬祖研讨会」的论文集，1985年出版。

- (3) ?黄伯和等，《基督徒与祭祖》，台北雅歌出版社，1994年。
- (4) ?邢福增、梁家麟着，《中国祭祖问题》，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7年。

### 第二课 新教来华

- 一.
  - (1) 居留身分；
  - (2) 无法接近中国民众；
  - (3) 学习中文；
  - (4) 不友好的宗教环境（澳门天主教）。

从马礼逊面临的困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后为什么有的传教士不惜违背圣经的教训而藉助于“人为”的方法进入中国。

- 二.
  - (1) 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
  - (2) 在中国译出第一本中文圣经；
  - (3) 编印第一本华英字典；
  - (4) 开办第一所西式（教会）学校；
  - (5) 创建第一家基督教医疗机构；
  - (6) 出版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

从这六个“第一”可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基础，实由马礼逊奠定；基督教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也由马礼逊开始。

三. 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以基督教为旗号的中国农民战争。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得到一部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几次考试不中以后，才精读此书，遂大彻大悟。1843年，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创“拜上帝会”。1847年3月，洪秀全、洪仁玕到广州，从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孝全（I. J. Roberts）学习基督教常识。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英勇奋战，不计生死，不到八个月时间，就打下了南京。这一方面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军队是宗教化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军政制度多有基督教的内容，太平军人人必须遵守的“十款天条”（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就是“摩西十诫”的翻版。占领南京（建都于此，改名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这时，洪仁玕来到天京，受封“干王”，主持军国大事，与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共扶天国。洪仁玕曾在香港做过伦敦会的传道人。他写了一部现代国家的建国纲领，叫作《资政新篇》，其中的很多方案，比如设立专利制度等，中国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设立。可惜当时处于战争环境，这部建国纲领未能施行。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曾到太平天国拜访洪仁玕，洪仁玕介绍他与洪秀全见面，杨格非要求准许自由传教，得到了洪秀全的允准。杨格非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他们的宗教，虽有不少错误，然其中仍有几个重要点为他们所清楚明了并热诚信守的，而这几项也正是我们的宗教之根基，无此便不成为基督教了。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是正确的。”但是更多的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在教义和礼仪方面的中国民族色彩，都是异端的表现，必须坚决反对，于是鼓动本国政府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最后，在中外反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坚持了十三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败亡。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运动深受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传播，就不会有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运动。

### 第三课 传教保护条款和民教冲突

- 一. 传教保护条款的内容已见本课。一些传教士千方百计地在平等条约中列入这些条款，出发点是为了使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免受无谓的迫害，便于传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但是，这些条款趁帝国主义军事力量战胜之余威而写进政治性的外交条约中，不能不使人觉得帝国主义侵华和传教事业如出一辙，给传教事业带来无比巨大的负面影响。再者，条款中对习教者一体保护的提法，从字面上看，并无不公平处，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提法不只不公，简直可说霸道。由于这些条款的制约，在日后的民教冲突中，清朝政府不得不作出有利于教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决定，根本无法秉公办理。还有，条款中对中国信徒的保护，在执行中使一部分中国人成为政府的治外之民，这就为伪信者、吃教者和混入基督教的不良分子在基督教旗帜下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更不幸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了欺蒙国内公众，有意利用这些条款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就更使得传教事业脱不了与帝国主义侵华的干系。因此，从局部的和眼前的角度看，传教保护条款促进了当时的传教事业；但从全局的和长远的角度看，这些条款给传教事业带来无穷祸患，成为传教事业在中国开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 二. 注意：（1）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侵华本为二事，但又有两点巧合；（2）二者之间有相互利用的问题：一些传教士利用帝国主义侵华的机会进入中国，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中的问题作为侵华战争借口；（3）应把利用帝国主义侵华推进传教事业的少数传教士和大多数西方来华传

教士区分开来；应把藉帝国主义侵华推进传教事业的传教士与一心一意信靠神推进传教事业的传教士区分开来。

- 三. 戴德生对民教冲突的态度已见本课。戴德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他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不是中国，是上帝。”他热爱中国，信靠上帝，完全凭信心服事上帝，坚拒英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支援，以信任取代疑惑，以爱化解恨。正因如此，他才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人物，他所开创和领导的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才成为西方基督教差会中传教成果最为丰硕的差会。

#### 第四课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 一.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可分五个方面进行说明：（1）最先开办现代教育（参考第二课）；（2）帮助官方兴办现代教育；（3）开女子上学的新风，差不多每一个差会都办有一所女子学校；（4）最早派遣留学生，推动留学潮（参考第二课）；（5）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发展教育。

补充材料(1)基督教与清华大学: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谕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一千一百六十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补充材料(2)基督教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和首批中外教习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1951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由于北京大学占用原基督教燕京大学校园,因而燕京大学与文学、理学、法学相关科系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可分四个方面进行说明：（1）开办现代医疗事业。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大特色，也有很高水平，但也有许多弱项，比如外科手术、麻醉术、消毒术、流行病学、预防医学方面都不如现代西医。传教士把现代医疗事业引进中国，不仅造福于中国广大人群，也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创办专门医院。中国的妇女儿童医院、麻疯医院、疯人院、疗养院、戒毒所等专门医院都是基督教会最先创办的；（3）进行医疗教育。基督教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医学院校，还送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医学人才。中国第一位西医黄宽以及金雅妹、柯金英、石美玉等第一代中国女医生，都是基督教培养的果实。（4）翻译出版医学著作。基督教在这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仅广州博济医院第二任主持人嘉约翰医生就出版了《论发冷小肠疝两症》、《经验奇疾略述》、《奇症略述》、《西药略说》、《割症全书》、《化学初阶》、《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名目》等书。

补充材料 基督教与北京协和医院:1861年伦敦会传教士骆克和在英国驻华使馆旁创设一间“施医院”,1864年由德贞医生接办,迁院址于米市大街,收学生数十人,又翻译《全体通考》、《西药大全》等书。1895年增设妇女儿童医院。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医院被毁。1901年租房开诊,逐步恢复原有规模。1903年增设大药房。1905年开办协和医校,为中国当

时层次最高的医学院校。后得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赞助，院务大为扩充，至今仍为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 三. 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物质层面进行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制度层面进行的改良和革命。第一阶段中，主要是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坚船利炮。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编撰发行书报，大肆宣扬西方科技，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一些传教士还躬行示范，大力提倡西方科技。比如，李提摩太就曾在山西为官绅阶级开过系列科技讲座，其题目如下：
- (1) 哥白尼的天文发现；(2) 化学的神奇；(3) 机械的功用；(4) 蒸气的妙用；(5) 电的功能；(6) 光的作用；(7) 医药与手术的神迹。同时，又开办现代教育，为中国培养现代化所需的人才。一些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洋务机构，比如丁韪良进入同文馆，林乐知教士进入上海的广方言馆，直接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第二阶段的改良运动期间，主持维新的光绪皇帝是基督教《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大部份来自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还在基督教报刊上批评时政，倡导改革，主导时代潮流。仅《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有关变法的论文就有数百篇之多。在第二阶段的革命运动当中，基督教的作用就更大了。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是受洗重生的基督徒。从启蒙到大学毕业，他所受的教育，全部为基督教所提供。1883年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在他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华侨教会和欧美教会是他宣传革命、募集经费、吸收同志的主要地方。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很大。领导惠州起义的郑士良，与孙中山、杨鹤龄、尤列并称“四大寇”的陈少白，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皓东烈士、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壮志未酬的史坚如烈士等，都是基督徒。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4月，临时国会召开，至少有六十名议员是基督徒。当时的内阁和政府领袖中，孙中山、王宠惠、王正廷、陆征祥、陈振先等，都是基督徒或具浓厚基督教背景。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各级官员，百分之六十五是基督徒或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 第五课 从“五四”运动到“非基”运动

- 一. 非基运动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一批接受了新思想而不愿意看到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青年学生，藉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之机，发起非基运动，全国学生响应，声势浩大，但基本上是学生自发的运动，缺乏组织性，暑假来到，学生回家，秋季返校，大多数学生就兴趣不大了，所以运动就沉寂下来。这是1922年的情况。第二阶段是1924年，非基运动因教会学校学潮重新激起。这一阶段，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积极参与领导，再加上和当时社会“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所以对教会的冲击要比第一阶段强得多。第三阶段，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非基运动再起，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加以攻击。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则藉反对教会之手段，为主义的活动；在国家主义者，则藉反对教会为排外之表示”。教会受到空前的压力。第四阶段是1926—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期间，非基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争行动结合起来，产生强大的暴力攻击性，传教士和教友遭到逼迫甚至杀害，教会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
- 二. 本课分为三种类型：(1) 护教反击型；(2) 漠然视之型；(3) 研究自省型。其实还应加上(4) 临阵脱逃型。有少数信仰不坚的基督徒，在强大的压力下背离了教会。

## 第六课 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

- 一. 在中国民族主义怒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一部份领袖为了消除教会的西方色彩，解消教会与中国同胞的误会和隔膜，实现本土化，担负起向广大同胞传福音的重任，于是建立了自立教会。
- 二.
  - (1) 凭信心工作；
  - (2) 靠圣灵导引；
  - (3) 布道本土化；
  - (4) 有排斥西方教会传统的倾向。

## 第七课 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 一. 中国教会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教会救死扶伤，拯济难民，坚持办好教育为战后国家的重建培养和储备人才，帮助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充分表明中国基督徒爱国不落人后。西方传教士除了大力开展救济工作外，还为中国的抗战大造舆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表现了他们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精神。所有这些，都使国人原来对基督教的误解大为消除，有利于中国教会的生存和发展。
- 二. 大后方教会工作的新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开展在少数民族中的布道工作。中国西南各省，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大多数少数民族以前都从未听闻过福音。中国教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华基督教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团”。（2）是学生工作。国民政府内迁之时，随同来到大后方的难民中，以青年学生居多。他们离家出走，生活接济中断，处境十分困窘。为了帮助这批国家各方面的未来人才，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和世界学生联盟在英、美努力筹集款项，交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负责在长沙、南昌、桂林等地分发，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报效祖国。由于战争胁迫，生活艰辛，大后方许多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亟需主耶稣的救恩。一些初出茅庐的布道家与西方差会内地会亲密合作，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发起了奋兴运动。1944年冬天，布道家赵君影在中国抗战首都（陪都）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布道三天，每晚出席的都约有二千人，在台前认罪悔改，决心归主的青年学生至少有二百人。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举办了“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参加的有四十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百四十多人。会后组织了“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由赵君影任总干事。回首当年非基运动中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攻击，今日的成果就更加令人欣慰。

## 第八课 当代中国教会

- 一. 当代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已见本课。现补充一些数字如下：

1949年	受洗会友	936,077人
	教会	11,992间
	其他崇拜点	7,624个
	牧师	2,145人
	传道与教会同工	8,509人（据《世界基督教手册》1952年版）

1980年	基督徒	1,000,000人	(据丁光训言)
1982年	基督徒	3,000,000人	(据中共中央19号文件)
1985年	基督徒	4,000,000人	(据中国基协发表)
1990年	基督徒	5,000,000人	(据新华社报导)
1995年	基督徒	12,630,000人	(据爱德基金会发表)
1997年	基督徒	13,320,000人	(据爱德基金会发表)

二. 未参加三自会和未向政府登记的教会，一般在家庭里聚会，人们称为“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那时，许多基督徒，特别是乡村信徒，已经有了在家庭中查经、崇拜、祷告的习惯。五十年代，基督教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到1958年教会大量关闭，剩下少数教会也基本上不讲《圣经》而讲政治思想教育。一些敬虔的基督徒索性不去教会，就在家庭中查经，崇拜、祷告、团契。这就出现了家庭教会。虽然基督徒在家庭中的聚会不受法律的保护，却一直充满活力地进行着；即使在全中国最为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聚会仍有新的发展。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编号：[1982] 19）中有一段话提到家庭教会：“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文中“爱国宗教人员”，指三自会教牧，“适当安排”，指由三自会建立聚会点，取代现有的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领袖对这一规定的反应不一：为数不少的人因为三自会在以往极左年代严重伤害了教会和教友，现在不但不赔礼道歉，承认过错，反而以“一贯正确”的面目出现，怕以后遭到新的伤害，所以坚决不肯与三自会合作。有些人认为，三自会在国家的立场上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架构，教会可以在其中成长，因为“葡萄架或许是死的，但葡萄藤却有生命”；也有人自信可藉内心属灵的工作来传播福音，没有必要与三自会公开决裂：所以有的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合作；或者已向政府登记，成为政府允许的聚会点。

不肯与三自会合作的家庭教会，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一些地方，当政策或地方干部左倾的时候，对家庭教会的压制和逼迫就会加大力度。但是，在他们面前，最大的压力来自全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冲击。而且，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家庭教会，比较容易感染异端的病毒。